

中国 当代 小说主潮

崔志远 等 著



商務印書館

中国当代小说主潮

崔志远 徐彦利 李 静 著



商務印書館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小说主潮 / 崔志远等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12

ISBN 978-7-100-05709-7

I.中… II.崔… III.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IV.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938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伸课题

河北省高校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当代小说主潮

崔志远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制

ISBN 978-7-100-05709-7

2007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7年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5 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5 000 册

定价:36.00 元

序

王庆生

崔志远教授是我相识多年的老朋友。2005年11月,收到他刚刚出版的《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这部48万字著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用张炯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书,也是对我国文学创作会有良好影响的书”。事隔一年半,崔志远教授打电话给我,嘱我为他的新著《中国当代小说主潮》写序,当时我既感高兴,又有点惊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能够出版两部学术著作,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后来待我读完《中国当代小说主潮》校样,才知这部新著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这一课题研究的延伸和深化,而由课程研究所派生的“中国当代小说主潮”这门选修课,已为本科生、研究生讲过七遍。这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这部史著既是崔志远教授多年教学与研究的心血结晶,也是继《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之后的又一力作。

1

序

小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一个时期小说创作成就之大小,是衡量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就当代中国小说而言,尽管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但总的发展趋势仍是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面对繁复多姿、异彩纷呈的小说世界,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理应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今,加强当代小说的研究。据我所知,这一研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现为中国新文学学会)1981年在庐山召开学术年会时,就提出了编写《中国当代分类文学史》的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汪名凡主编的《中国当代小说史》、卢启元主编的《中国当代散文史》、高文升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文学史》、王晋民的《当代港台文学史》等史著于90年代初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姚雪垠在《中国当代分类文学史》总序中说,“一切历史的编写,有一个总的目的,也是一个基本要求,即是为当前服务。古人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又说‘鉴往知来’,都是说对历史经验的探索与总结,要为推动今天和将来的社会活动起指导作用。编写当代分类文学史的基本目的也是如此”。此后,关于当代小说史的研究,已有多部著

作面世,如金汉的《中国当代小说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应锦襄、林铁民、朱水涌的《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学军的《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刘克宽的《当代小说艺术形态散论》(齐鲁书社,2002年),吴培显的《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湖南师大出版社,2003年),程文超、郭冰如的《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演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董之林的《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许志英、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张卫中的《新时期小说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汤哲声主编的《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这些论著研究的视角不同,重点不同,但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其间既有中国当代小说的整体研究,也有分阶段的研究;既有历史的美学的研究,也有文本艺术研究。从总体看,当代小说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化,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相对地看,近年来历史的美学的研究相对薄弱,研究的深度也有待加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由文本关注到历史文化关注。西方由20世纪20年代兴起,兴盛了半个多世纪的形式主义批评已趋衰落,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历史文化批评勃然兴起,中国当代文学自80年代末的先锋小说之后也开始向现实和社会回归。对当代小说史的历史美学研究,无疑应当受到重视。特别是在当前“祛历史”、“祛精神”成为一种时尚的情况下,迫切需要站在新世纪的高度,以历史的美学的眼光对当代小说进行整体性把握。《中国当代小说主潮》则在这方面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和探讨,同时,也兼有思潮流派和文本叙事的研究。

在我看来,崔志远教授的这部著作,大体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运用整体性研究方法研究当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主要脉络。所谓整体性研究方法,即将当代小说置于20世纪的时代生活进程、民族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格局的宏大背景中进行分析 and 思考。《引论》便运用这种方法,在时代生活进程、民族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格局三维坐标系中研究20世纪文学,勾勒其发展的主要脉络:“五四时期出现启蒙现实主义,创作实绩是五四新文学,代表作家为鲁迅。30年代出现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实绩是革命文学,代表作家为茅盾;同

时,启蒙现实主义仍在发展;两者共创30年代文学的辉煌。40—7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创作实绩是工农兵文学;启蒙现实主义则处于低迷和压抑状态,乃至进入‘潜在写作’。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启蒙现实主义得以复兴,创作实绩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知青文学等。80年代中后期出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潮起潮落,其创作实绩是现代派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90年代以来的文学出现多元发展的局面,多元中有着回归写实的倾向,如新写实小说的生存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分析现实主义,女性文学的私密写实,新历史小说的碎片写实,晚生代小说的欲望写实,新新人类小说的时尚写实等。”了解了这一脉络之后,当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在20世纪文学中的地位就清晰地揭示出来。此外,本书的《结语 建构现实主义主潮与西方文学新潮的互动关系》也运用这一方法,对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路向进行展望。总之,这部著作运用整体性方法揭示出当代小说发展轨迹和基本规律,并确定研究的基本思路。

为了更好地勾勒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轨迹,著者还运用整体性方法对当代小说进行了多方位的整合。即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整合,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整合、新时期小说多种创作思潮的整合。这一整合一方面从纵向上阐明了当代小说发展的传承关系,说明当代小说出现今天这样繁荣的局面不是偶然的,而是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承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又从横向上说明新时期小说尽管旗号林立,各具风采,但各阶段每一种小说现象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和前后联系。通过上述从宏观到微观的层层整合,比较明晰地显示了文学的发展流变和内在关联,当代小说不再是互不相关的甚至反差很大的几个板块,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相互联结的有机整体。

二是运用多重理论批评视角考察研究当代中国小说的发展。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外来文化和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以文学研究新方法的探讨为前导的文学批评、研究方法的变革,突破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单一视角,改变着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面貌。当今的文论建构学派众多,研究方法多样。既有传统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也有过去早有而未能普遍应用的比较文学方法,更有人本主义、自然主义、文化主义、审美主义文论以及系统网络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无序有序过程法、模糊分析法等等,这些方法虽然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我国的各种文学批评视角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而且为文学理

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本著作在充分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历史主义和审美主义视角,但同时也涉猎文本主义、文化主义和人本主义等批评。如此,既能把握当代文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又能描绘其多彩风貌。具体地说,本书对当代文学进行整体性考察后,确立现实主义是其主潮。作为美学和历史批评的现实主义理论便是一个重要视角。本书对现实主义进行梳理考察后,认为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在认识方法层面上,强调客观写实原则;在艺术思维方法上,强调典型化思维;在艺术手法层面上,强调细节真实的写实手法。以此评判当代小说作家作品及创作思潮,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如对工农兵文学、新写实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分析等。同时,当代文学发展除现实主义主潮外,还有各种创作思潮,诸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因而又用各种新潮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如用文化主义理论分析寻根小说,用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照先锋小说,用存在主义观照新写实小说,用新历史主义观照新历史小说,用女权主义观照女性小说等。这些对位性分析可称为同向研究。本书在同向研究的同时,还运用错位性分析,即在同向研究中融入反向研究,如以新潮理论观照现实主义创作,或以现实主义理论观照新潮创作,如此,可透析研究对象的缺陷和误区,以引起读者的警觉。前者如以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剖析工农兵文学中革命历史小说的人本关系结构,概括出其英雄引路人模式,发现其结构的单一性和雷同性;后者如分析新历史小说《红粉》,在运用新历史主义分析了它放大历史“碎片”颠覆历史“整体”之后,又进行历史主义观照。认为“《红粉》放大的小历史却令人怀疑,不加批判地书写妓女心甘情愿地恢复昔日的生活,向读者述说,做妓女比摆脱妓女生活更幸福,沦落比新生更有合理性,从而颠覆建国初期妓女改造的大历史。这种意识形态性实不值得恭维,这种‘新’实在是一种‘旧’,甚至连《卖油郎独占花魁》都不如。”这些分析无疑是有见地的。

三是把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探讨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流变的内在成因。就当代小说研究来说,微观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宏观是微观研究的升华和提高。这部著作正是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研究的。在宏观研究上,著者十分注意当代小说发展的整体特征把握,注意小说自身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如研究革命现实主义、启蒙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流变,注意厘清这些创作流派的来龙去脉,探讨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衍变规律;在微观研究上,著者十分注意文本的解读,在剖析代表性文本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阐释。如分析女性文学的“私秘

写实”作品,一方面肯定女性文学颠覆男性话语与权威,显示了强烈的现代性精神和自审意识,实现了由写“我们”到写“我”的转变,标志着具有女性意识文学走向成熟的自觉;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女性“私人化”写作随着自身逻辑的不断演化,逐渐走向私语化、欲望化、肉身化的误区之中,走向荒诞的困境。这些细读文本的评析,切中肯綮,一语中的。

以上简要地概括了这部著作的长处和特点。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长处也有不足。这本史著虽然论述的对象仅是当代小说的主要发展思潮和流派,但涉及的面很宽,需要应答的问题很多,著者虽对当代小说各个时期的创作思潮作了梳理评述,但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未能充分展开,有待进一步深化。还有些问题,著者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是可贵的,但这些见解不一定能为所有人认同。好在现在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求得一律。

总的说来,《中国当代小说主潮》是一部主旨鲜明、视野开阔的书,也是一部内容翔实、颇富创意的书。为了写好这本书,崔志远教授艰苦跋涉,锲而不舍,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仅从书中引用的资料来看,理论著作有一百多种,涉及的作家作品就更多。著者不仅要占有这些资料,还要在众多的资料中扒梳搜求,梳理辨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些都非一日之功,它是著者长期积累、缜密思考的结果,体现了潜心治学、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我认为,这种学术精神不仅值得我们学习,而且需要大力倡导,特别是在当今浮躁之风盛行、功利化、物欲化影响文坛的“文学娱乐化”时代,更需要呼唤和弘扬这种“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的严谨治学精神。

是为序。

2007年5月23日勿写于桂子山

目 录

序	王庆生(1)
引 论 二十世纪文学视野中的当代小说	(1)
一、“20 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与阐释	(2)
二、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4)
三、中国当代小说主潮史	(10)
第一章 革命现实主义的兴盛与极端性发展	(13)
一、从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	(13)
二、“工农兵文学体系”概说	(27)
三、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	(40)
四、赵树理的民间叙事及历史命运	(55)
五、乡村叙事结构的演变	(72)
六、工农兵文学的爱情叙事	(84)
第二章 启蒙现实主义的复兴与发展	(102)
一、政治文化意识与五四文学精神	(102)
二、历史的反思: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	(110)
三、现实的思考:改革小说	(117)
四、知青小说的发展与变异	(124)
五、现实主义创作的贡献和启蒙性质	(129)
第三章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潮起潮落	(133)
一、现代派小说的发展演进	(134)
二、寻根小说的文化探寻	(150)

三、先锋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实验	(166)
第四章 多元发展中的写实走向	(182)
一、新写实小说:为生存的现实主义	(183)
二、新现实主义小说:社会分析现实主义	(198)
三、新历史小说的“碎片写实”	(212)
四、女性文学的“私密写实”	(224)
五、晚生代小说的“欲望写实”	(235)
六、新新人类小说的“时尚写实”	(250)
七、乡土移民小说的“苦难写实”	(260)
结 语 二十一世纪文学展望	(273)
一、建构现实主义主潮与西方文学新潮的互动关系	(273)
二、发现精神的“眼睛”与文学精神升腾	(282)
附 录 综论茅盾文学奖	(292)
后 记	(323)

引 论 20 世纪文学视野中的当代小说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阿道尔诺等在研究社会和文艺的关系时,提出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的“总体社会”的概念,“总体社会”有着符合人类愿望的终极性质。马尔库塞认为,文艺具有超历史和普遍真理的性质,不仅属于一个特殊历史阶段,而且属于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的意识。因此,文艺不仅是直接与现存的社会有关系,而且与整个人类社会有关。它要求文艺家置身于现存社会之外,写出超出现存社会的合乎人类普遍性的作品,从而批判现存社会。阿道尔诺也主张,文艺超乎既定的社会形态之外又在社会总体上与社会保持联系,要求文艺家在总的主体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的。作家应是“社会总的主体的代理人。当他使自己服从艺术作品的必然性,他即从作品中去掉一切单纯可以归于他个人的偶然性。而在这样的代表总体社会的主体即代表法勒利的美的观念所诉诸的那种完整的人的职能中,同时也考虑到一种状况,它消灭个别化的命运,在它之内总的主体社会地实现自己。”^①两位学者旨在强调文艺的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性,然而不难看出,他们是在“总体社会”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上对“现存社会”进行观照和批判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这恰如中国绘画中的“远观法”:要捕捉山水精神,不可从近处求之,而应从远处求之,“传神要在远望中出”。苏轼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相识得庐山真面目,就须跳出此山之外,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中观察之。

上述理论灼见为研究当代小说提供了良好的观照方法。基于此,研究当代小说,就不应就当代而言小说,而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学背景中去观照和研究。笔者首先想到的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

^① 转引自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第 35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一、“20 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与阐释

1985 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第 5 期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中国现当代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在当代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文章认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学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20 世纪的文学具有如下鲜明特征:

(1) 汇入世界文学格局。19 世纪末,世界文学格局初步形成。拉美、亚非、欧洲以不同的姿态进入世界文学格局。我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便有意识地学习西方,不过首先是“船坚炮利”,继而是政治、经济、法律,然后是文学艺术,自 1840 到 1998 年,古典文学并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从 1898 年戊戌变法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格局。从提倡白话文到大量翻译西方作品,再到文学观念、文学体裁、手法的大变革,中国文学实现了悲壮的腾飞。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个辉煌的高潮。“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同时展开为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两个侧面:所谓‘欧化’(其实是‘世界文学化’)和‘民族化’。”当着这两个侧面极端性发展的时候,就形成鲁迅指出的“内外两重桎梏”。因此,欧化与民族化,成为 20 世纪不断言及的话题。“‘世界文学’逼迫每一民族,不管你有多么辉煌过去,请拿出当代最好的属于自己的文学来!”(2)“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启蒙的基本任务和政治实践的时代中心环节,规定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因而思想性始终是对文学最重要的要求,顺便也左右了对艺术形式、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的基本要求。”“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包括两个相反相成的分主题:一是否定的方向,以鲁迅式的批判精神,深刻而尖锐的抨击长期的封建社会造成的国民劣根性,不朽的阿 Q 体现着其创作实绩;二是肯定的方向,以满腔的热忱挖掘“中国人的脊梁”,呼唤一代新人的出现,或者塑造出理想化的英雄来作为全社会效法的楷模,这方面的人物形象常常游移变化乃至前后矛盾情况,显示着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作用下对

“理想人物”的不同理解。与总主题相联系,两类形象受到格外关注: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这两类形象之间,总主题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变奏和展开;灵魂的沟通,灵魂的震醒,灵魂的高大与渺小,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等等。文学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自我启蒙’精神,那种刻酷的自责和虔诚的反省,是以往时代的文学和别一国度的文学中都没有的。”“改造民族灵魂”真诚的自我反省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层面上,缺乏哲学深度,这正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因而,20 世纪文学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

(3)“悲凉”的现代美感特征。“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使 20 世纪中国文学充满了危机感和焦灼感。中国文学由古典的亦剑亦箫的“中和”之美到充满民族危机感的“焦灼”,是一种现代性变革。“焦灼”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情感,不过中西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的焦灼感一般体现在个人的生理、心理层次,以及形而上的哲学层次。中国文学的危机和焦虑总是很快就纳入全民族的危机感中,个人的焦灼总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焦灼”情绪的核心是一种“现代悲剧感”,准确地说,它是一种“悲凉”的现代美感特征。悲凉的美感意识常包裹两种不同的色彩:理想化的激昂和冷峻的嘲讽。前者着眼于民族的新生的辉煌远景,如郭沫若的《女神》;后者着眼于民族灵魂再造的艰巨任务,如鲁迅的《呐喊》、《彷徨》。“也有这样的历史时刻,那是冷嘲被‘激昂化’而变成一种热讽,激昂被‘冷嘲化’而变成一种感伤,于是两者相互削弱、冲淡,使得一种严肃板正的‘正剧意识’浮现出来成为美感色彩的主导。”(4)艺术思维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艺术形式的变革。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本世纪这样的“形式大换班”。古典的诗、词、曲、文一下子失去了文学的正宗地位,文言小说基本消亡了,话剧、报告文学、散文诗、现代短篇小说这样一些全新的文体居于主导地位。在形式革命中,语言的变革首当其冲,白话文运动这场语言革命,甚至是民族文化再造的重大关键。白话文运动的根本意图是“传播新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播新思想,必须引进新术语、新句式,采用中国老百姓还不习惯的新语言、新形象和新的表达方式,因而在传播上就存在无法“释解”的困难;二是传播新思想,必须使思想平民化、通俗化,从形式上迁就普遍落后的文化水平的同时,也就隐伏着先进的思想内容被陈旧的形式浮浅化的危险。如此,雅俗之争、普及与提高之争、“主义”与“艺术”之争、宣传与娱乐之争、民族化与现代化之争,贯穿了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些矛盾的张力场中,散文小品最为幸运,小说次之,戏剧相当艰难,诗的道路最为坎坷不平。这与各种问题

的本性有关:诗的思维具有先锋性,在形式探索上走得最远,引起的争论也最激烈;戏剧由于观众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形式变革缓慢而扎实;在小说中,短篇具有类似新诗的先锋性,中长篇则变化较缓;散文在体裁上有极大的“宽容性”,形式革新中阻力较小,但也缺乏由压力转换而来的动力。

20 世纪文学同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一样,完成了其现代化进程;上述四个方面,正是中国文学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现代性特征。“20 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体现着文学现代化的整体过程。正因如此,黄、陈、钱在文章中指出:“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笔者以为,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便可摆脱社会政治史,尤其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在内的社会发展史。上述所论四个特征——汇入世界文学格局、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悲凉”的现代美感特征、艺术思维的现代化——都与社会的发展史密切相关。马克思一方面强调艺术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一方面又强调经济归根到底的制约作用。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 年 1 月 25 日)讲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间段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文艺同社会局部性不平衡而整体性平衡——这是马恩为我们指出的重要规律。由此可知,20 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既可看到文学自身发展阶段的完整性,又可看到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平行性。探讨较长时段的文学发展,不可不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重要依据。

二、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在了解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后,还应进一步梳理其发展的基本脉络。

20 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确立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里研究文学的发展脉络,必须有科学的方法体系。我首先想到的是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

恩格斯在 1890 年至约瑟夫·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

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20世纪文学的历史已可以作如是观。一个个合题组成一个个平行四边形,众多的合题组成众多的平行四边形,这些平行四边形形成无数交错的力量,其合力便是文学的发展和演进的驱动力。如果把这种思想稍加发挥,可以把平行四边形分出不同的层次:众多小的四边形的合力组成较大的四边形,较大的四边形的合力组成更大的四边形……最终由少数重大四边形的合力构成文学史的综合力。如此,在思考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的时候,则要寻找巨大的平行四边形的重大合力。

什么是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巨大平行四边形的重大合力呢?黄子平等《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方法论的“整体意识”:“一个宏观的时空尺度——世界历史的尺度,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置于两个大背景之前:一个纵向的大背景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一个横向的大背景是本世纪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不单是东、西文化的互相撞击和交流,而且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学在本世纪的崛起。”其实,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即二十世纪时代生活进程,它对文学的发展更有决定作用。如此,时代生活进程、民族文学传统、世界文学格局就成为决定文学发展的巨大平行四边形的重大合力。其中每一合力都由多层次小的平行四边形构成。在重大合力的层面上,存在着这样的合题:文学分别同民族文学传统、世界文学格局、时代生活进程的合题,以及民族文学传统、世界文学格局和时代生活进程三者形成的合题。

其一,从时代生活进程看,20世纪的百年中国由古老的农业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其间,封建统治腐败,帝国主义侵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国家风雨飘摇。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儿女的坚强奋斗下,获得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社会建设的全面胜利,完成了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表现出此起彼伏的不平衡性,常常是某一领域的单项独进,继而此起彼伏,交错发展。其总体指向是诸领域现代化的综合性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如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走的是“洋务运动(经济)—戊戌变法(政治)—梁启超的“三界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政治)—新时期思

想解放运动(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曲折道路。如果说,20世纪经济、政治、文化的轮番出击是一个个的分题,那么,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进行回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共同指向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合题。而且,进入新世纪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可能。“三个代表”的思想,提出政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经济(先进生产力)、文化(先进文化)的现代化高标和三大领域的协调发展。它显示着新世纪中国的决策者们全面推进祖国现代化的气魄和决心,也显示着我国各个领域实现现代化的自觉性。毫无疑问,这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广阔前景。

百年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合题效应必然影响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征的百年文学史。统而言之,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门类,作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艺术显现,表现出如下特征:(1)它或前进,或困惑,或遭遇挫折,或处境顺利,都紧紧和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关注着历史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国民素质的改善,人性的完善。它与经济的发展相联系,也不与政治分离,它是现代性文化的有机构成,体现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这是一种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文学,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的现代传统。要想使文学放弃民族和历史的责任感无异于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切将文学锁在舞厅酒吧里埋在石榴裙下系在裤腰带上的企图都将被文学的历史所淘汰。(2)在上述现代化轨迹中,文化启蒙和政治、经济实践交替进行。就本世纪看,文化启蒙是梁启超的文学革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的文化启蒙,其间产生的文学主要是启蒙现实主义文学;政治经济实践是辛亥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和新时期的经济变革,其间产生的文学主要是社会分析现实主义。一般地说,文学本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对文化的反映比较便当,文化比较容易进入文学的审美视野,故有三度文化启蒙时期的文学辉煌;作为对现实进行审美把握的文学,便不能直奔政治和经济,“文学从属于政治”已给文学留下惨重的教训,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文学也出现了众多缺憾。文学既不是政治的婢女,也不是经济的附庸。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伟大的作品,总是同时代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这种差异形成的张力能使作家超越普通人,超越世俗观念,以自己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整合出显示人类终极关怀的形而上哲理。

20世纪的时代生活进程,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这是一个从文化启蒙转变为政治革命实践的时期,时间跨度是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六七十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五四文化启蒙催生出启蒙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他高举现代性的启蒙武器,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揭示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之外,尚有胡适、周作人等的启蒙理论建设,叶绍钧、杨振声、冰心、王统照、郁达夫、周作人、朱自清、田汉、丁西林等的创作成果。30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革命催生出社会分析的现实主义。文学“从家庭到十字街头”,“中国半殖民地化”引起作家的广泛关注。代表人物是文学巨匠茅盾,《子夜》便是典型的社会分析现实主义文本。此间出现一支壮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队伍,包括沙汀、吴组缃、叶紫、蒋光慈、柔石、胡也频、丁玲、张天翼、周文、艾芜、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艾青、夏衍、熊佛西、李健吾等。这一时期,鲁迅的启蒙现实主义也在蓬勃发展,鲁迅之外,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废名等进入创作辉煌期,不过,也明显受到政治斗争风云的影响。两支队伍的蓬勃发展,创造出我国30年代文学的辉煌。40-70年代,社会分析现实主义发展为工农兵文学,社会分析升华为阶级分析,并居于绝对优势。工农兵文学产生于40年代前期的解放区文学,新中国建立后成为文坛的主导方向,并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形成创作高潮。与此同时,启蒙现实主义受到压抑和批判,胡风、冯雪峰、邵荃麟等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理论家,赵树理、郭小川、萧也牧、马烽、西戎等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作家屡屡受到批判。文革十年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极端发展期,工农兵文学的浓重的政治色彩使之沦为政治家与阴谋家的政治工具;这也是启蒙现实主义的极端压抑期,只能以“潜在写作”的方式存在于民间。

(二)从思想解放运动到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由文化启蒙到经济实践的转变期,时间跨度是由粉碎四人帮开创的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启蒙现实主义文学得到复苏,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是其辉煌的实绩。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文化资源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带来我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潮起潮落,现代派、寻根、先锋文学是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大潮对文学形成强大的冲击波,文学或者表现人们被市场经济激起的强烈欲望,或者表现各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再分配,于是形成两种重要的文学潮流:欲望写实和社会分析现实主义。前者如新写实、新历史、晚生代小说,女性文学等,后者如新现实主义小说、乡土移民小说等。

其二,从世界文学格局看,如果说世界文学格局形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那么,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便汇入世界文学潮流。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情势下走向世界的,开阔的胸襟里带着顶礼膜拜的自卑,严肃负责